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书刊评论】	文革研究拓展纵深的标志	
	——读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宋永毅
【春秋史笔】	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胡鹏池
【读史笔记】	《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	文 研
【研究评论】	警惕对“文革”的过度理想化解释框架	陶东风
【冷暖人间】	劫后拾珠——记北京 101 中学文革中的几件小事	曹 培
【往事非烟】	动农馆旧事追忆	陈光海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书刊评论】

文革研究拓展纵深的标志
——读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 宋永毅 •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已经出现了向纵深拓展的新趋势。今年年初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近百万字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便是这样一个可喜的标志。一方面，它代表了文革研究从概括性的全国史向细节性的地方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整个宏观的文革做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论思考。

◇ “十年磨一剑”的产物

该书的作者李逊，原是一位旅美女性学者。她可能不广为人知，但在文革研究圈内却绝不是新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就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6）。应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女教授裴宜理邀请来伯克莱加大当访问学者后，又一起出版过英文专著《无产阶级的力量》（1997）。本来，熟悉她的朋友们都以为李逊会一直留在美国，边工作，边继续她的研究。不料，十一年前我突然接到她的一个告别电话，说她已经辞去了在伯克莱加大的工作，马上回上海：准备用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查上海文革史，写出一本有深广度文革地方史来。接到这一电话，我久久无语……。李逊和我是同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曾为所谓的“革命”欺骗而狂热过，今天一般说来已经很少再有献身的热情了。而年近花甲的李逊却再一次表现出那种久违了的青春期的热诚——当然，这一次是对曾经欺骗了我们的“革命”的历史解剖的献身。十年后，当我看到李逊这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它不仅代表了李逊十年磨一剑的不懈，更包含了一代人对自己以往人生的沉甸甸的思考。

◇ 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细节和偶然

李逊的专著分为四十章，时间上早到“批判《海瑞罢官》”，晚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事件上大到赫赫有名的“一月革命”和工总司，小到鲜有人知的“中串会”及一些“另类思潮”，实在是前后左右、事无巨细，都包罗在她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就来自边缘的“另类思潮”而论，从憧憬河归旧道的“共向东”，到直接挑战毛泽东的王申酉，也无一遗漏。尽管我也是上海文革十年的亲历者，但阅读李著，仍给我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新掠影之感。

这里，历史的新视野不是由抽象的理论，而是由细节和偶然在于无声处展现的。例如，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上海一月革命发端的《文汇报》造反派的“接管”，后来曾被认定为全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序幕。但根据李逊的深入调查，它其实并不是源于该报造反派的“路线斗争觉悟”，相反是一种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诉求。因为打到了太多的“走资派”，当时的《文汇报》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员工怕被上海的另一大报《解放日报》吞并，个人利益会收到波及，才匆匆忙忙宣布接管，以保住大家在乱世中的饭碗。不料这件事竟会被千里之外的毛称赞为“一场大革命”，并拔高到了对全国文革运动起了巨大的方向性的指导作用的程度。

◇ 文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思考

有建树的历史研究，不仅在于深入细节的扎实调查，还在于从万千细节中升华出闪光的理论来。纵观李逊百万字的史稿，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史实重构以后，她都立出一个千字左右的“小结”，做一点别开生面的理论探讨。如第二十二章“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的小结指出“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再如，第三十五—三十六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的结尾总结道：“文革初期造反派到处炮轰和批判，而他们对规则和秩序被破坏后的混乱却不必担当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原来的干部承担，并成为打倒他们的理由。不过，当文革开始恢复秩序，担任了领导的造反派开始尝到他们自己破坏秩序的后果……他们面临的是两种角色身份的矛盾”——所有这些言简意赅的小结都有画龙点睛之妙。

李著题名为“革命造反年代”，顾名思义要探讨为何千百万民众卷入造反运动的动因。对此，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有过“受蒙蔽说”、“领袖崇拜说”和“人性险恶说”等等。李逊在她的“导言”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诱惑”之说。李著认为：“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则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转换等级身份的机会，而在“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革命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身分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共产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

读完李著，我在想：如果全中国每一个省市县，都能有一部由民间学者撰写的有分量的文革命地方史的专著，那该多好呢。

□ 原载香港《动向》2015年第十期

~~~~~  
【春秋史笔】

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 胡鹏池 •

历史会不断地提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要打倒刘少奇？

对此，毛泽东自己早有回答。1970年12月18日他曾明确地告诉斯诺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那就早啰！早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时就已经看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历史也会问刘少奇：你是什么时候觉察到毛泽东要打倒你的？

刘少奇在赴难前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了。刘少奇死后十年多，他的枕边人、他的未亡人双手捧着骨灰盒，将脸紧贴着，哭得泪人儿似的，却一口咬定刘少奇从来都是拥护毛主席的。王光美不仅至死不改口，而且还用实际行动促成了两家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许多人因此感叹道：刘少奇这个人啊，真是非常傻！直到文革开始，也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矛头就是指向他。

这可能吗？你相信吗？尽管有很多假象，但是人们即使用脚来思考，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是什么人？老资格的革命家。长期在党内斗争中摸爬滚打、久经沙场、大浪淘沙，屡获胜绩。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价他都是党内斗争的老手；而且在1966年的前后，他才68，耳不聋、眼不花；既不老年痴呆，也不老年昏溃，哪能“傻”到那样的程度呢？所以说，对于毛泽东日益增加的严重不满，刘少奇是有感觉的；对于文革的矛头所向，刘少奇也是有知觉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其实不需要举事实，只需要常识与逻辑就够了。何况还有许多事实为证，下面仅举一个经典场景说明这个问题。

（一）刘少奇陪同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1965年8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法国驻华大使。

那天会见的气氛真是特别的诡异呀？

这位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原本是来拜会刘少奇的，他的任务中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

很可能由于外事部门有关人员并没有将程序向老马交待得很清楚，所以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老马之所料。

先是外事人员将老马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老马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白头翁与长脸庞，而没有注意到刘的身后站着巍峨的毛泽东。于是老马第一个动作就是走上前去与国主席刘少奇握手致意，而没有趋前一步先去握党主席毛泽东的手。

老马在向刘少奇致意后将戴高乐的信递过去时，刘却沉默而没有作答。刘很清楚中国的政府首脑虽是他，但实际首脑却不是他。既然有毛泽东在场，就轮不到他表演。

随后，老马这才与毛泽东握手致意。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就开始同老马及其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侃起来。

老马是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后来用文学语言描绘了这天下午的谈话所留下的强烈印象：

毛“对形势现出悲观态度”，他的神情“像一个威严的皇帝，死板而又盛气凌人；又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毛的谈话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毛说：无论是工业问题还是农业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决好，好多作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在座的法国驻华大使显然对毛的谈话感到十分意外，以为他在“玩谦虚”，于是接着毛的话茬说：“中国青年对您制订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对于这样的恭维，毛不领受，而以一种略带嘲讽的语气反问道：“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

大使说他刚去了中国南方，并列举了一些所见所闻说明毛所受到的爱戴，可能还有形势大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类的。

大使的谈话中规中矩，中国人的对外宣传不都是这一套吗！中国人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欢听好话，为了让别人说好话，自己先把自己夸。

但这一回，毛却不一样。毛说：“你所见到的只能代表形势的一面，而你却没有看到另一面。”

“另一面？”大使问。

毛避而不答，王顾左右而言它。

毛将话题扯到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苏共22大”的讲话上。毛说：“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对法国客人补充道：“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老马还回忆说：毛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他差不多要对这些来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客人直言：中国快要复辟到你们那样的社会了。

毛还对老马说：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在结束谈话时毛陪着客人走出大厅，一边走一边再三地对老马说：

“我孤单一人率领群众”，“我孤单一人”。

老马后来这样回忆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刘少奇在整个一下午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其实，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天下午参加会见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陈毅的表现又当如何呢？当然也只能是“一言不发”。

老马的回忆里只提到刘少奇的“一言不发”，他说他为此大惑不解。老马对此“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刘少奇也会“大惑不解”吗？

毛泽东谈话的字字句句仿佛都是说给着他听的，冲着他来的，而“我孤单一一人，孤单一一人”的独白，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的。刘不傻，他能听不出来毛的“夹枪带棒”吗？《红楼梦》中宝玉房中大丫头袭人受了二丫头晴雯的气，抱怨道“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

刘少奇能问老毛“你终究是个什么主意吗？”刘少奇陪绑一下午，真够惨的；他能作出什么样的应对呢？他只能“一言不发”；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呢？只能是“如饮寒冰，如坐针毡”。

## （二）刘少奇无奈的选择

但是，有感觉的刘少奇为什么没有防范与应对？

“防范与应对”也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力度小，都是保守的、隐蔽的，甚至只停留在心理层面上。苦涩的酒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饮啜，回到家中对枕边人也说不上出口，一般人更是看不出来的。

他不好说呀！

第一、他不能肯定，心存幻想。刘少奇既不能肯定毛当真会对他下手？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手？他只是幻想着毛不至于对他下手？

第二、他估计不足，心存侥幸。刘少奇对毛的无情与凶狠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功绩估计偏高；对漫长的战争年代两人结下的所谓“革命友谊”有一厢情愿的书呆子气；对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过重；对写入宪法的“国家主席”地位有一种迷信。

所以，刘少奇虽有感觉，也意识到了危险，但他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危险居然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自从1965年11月11日离京至7月18日回京，云游在外整整250天。在这250天中，他调兵遣将，对发动文革作了周密的部署。当然，毛的大部分部署都不可能向刘公开，刘也不可能知道详细；但大部分部署也都是刘能感觉得到的，但是刘只能无奈。

正因为刘知道自己的力量与毛不相匹配，所以他不可能有有效的防范措施，更不可能奋起反抗。他既不可能“石头上摔乌龟”硬碰硬；也不可能“鸡蛋碰石头”以卵击石。他唯一

能做的防范与应对就是“装”。“装”这个词的下面能派生出很多成语，如“装傻充愣”、“装死躺下”等等。

刘少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得不去应对大量日常工作。他不可能“装死躺下”，下乡避祸，退居二线等等。毛泽东才有二线可退，有时毛泽东不高兴了，就宣布退二线；又有时毛泽东也是不高兴了，却宣布也不宣布，自说自话地又回到了一线。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可以在一线、二线之间自由地游渡，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党内高层的其它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和待遇，刘少奇也没有。

所以刘少奇只能“装傻充愣”，“装”着一副感觉迟钝的样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傻子”一样地干革命。本身不是“傻子”却要装着“傻子”，当然很矛盾、很痛苦，所以刘在那一段时期常发“无名火”。这从那一段时期刘在一些会议上的表现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心理分析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窝火”的心态下，就最容易发“无名火”了。一边发着“无名火”，一边在实际工作中加小心。如何在运动中不被抓到新把柄？是他必须考虑的事。

1966年6月1日晚间，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中央广播台广播，北京高校立刻呈现一片乱局，东城失火，西城冒烟，到处都在游街、抄家、戴高帽子，挂黑牌子。

面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远在三千里外的毛正在西子湖畔观风景，一副好心情，“排下窝弓射猛虎，安下金钩钓鳌鱼”，等着看鱼儿如何上钩吞饵。

“四清”还没有搞完，为什么要搞“文革”？“文革”究竟是如何一种搞法？底牌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刘少奇全都一头雾水。刘少奇主观上想问问清楚，他请示毛，打电话请示，写报告请示，但都没有收到效果。他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允许，约好了时间、与邓小平一起屁颠屁颠亲自飞到杭州去向毛当面请示。

无奈毛早已居心叵测，就是不告诉他“底牌”，以“相机行事”虚委搪塞。站在毛的立场上，这个“底牌”当然不可能告诉刘，确实也无法告诉刘。因为这个“底牌”就是要打倒你，打倒你的“底牌”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毛泽东没有告诉刘少奇底牌，刘少奇也揣摸不透毛的意图，转而自己去寻找最稳妥的办法应对。这个最稳妥的办法也被他那个形而上学的脑袋找到了，那就是“派工作组”。

### （三）“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说“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刘少奇此人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其次要谈到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 一、我们这代人对刘少奇的感知

对于隔代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我们对刘少奇此人不仅有一些感性的了解，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当然也都很肤浅，但也不乏正确之处。

我们这一代人都熟悉他的高鼻子、微微向前拱的嘴巴子、还有那一头银丝、两小撮亮眉，于是有一种慈祥之感；我们这一代人也读过他的两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论党》，听过或间接听过他的报告，感觉也不错，于是感到他是有学问也有修养的人，不是那种粗皮糙肉的大老粗；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六国”风光无限的纪录片，特别注意到他那个老婆王光美的绰约风姿。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漂亮的，也挺大方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只是稍稍有点“显摆”。不过也不到“臭显摆”的程度，所以一般人都不会太反感，当然江青除外；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曾两次看到王光美在清华挨斗。我敢说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情，并不认为蒯大富及其下属组织“捉鬼队”的行动是什么“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嘟噜乒乓球，穿着一层一层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我们对蒯大富的行为心生厌恶。我们不会像江青那样在电话的另一端嘎嘎地偷着乐出声；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后来挨斗时的照片。有好几个月没有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了，人已经走形了，神情很呆滞，惨不忍睹啊！

于是就有一种综合的感觉：刘少奇这个人啊！既不是那么傻，也不是那么机灵。他真要那么傻，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地位？他真要那么机灵，怎么可能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刘少奇当然是老革命，从事革命工作四十五年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有的是，一般的、正常的政治敏感性也都是有的，但他天生地缺少灵活性，更天生地缺乏想像力。刘少奇也有人文修养，但并不厚实；刘少奇也有逻辑思维，但并不致密；刘少奇尤其缺乏的是毛泽东那样天马行空、放浪不拘的形象思维；更缺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雄魂胆魄。

对于这样一个刘少奇，你能指望他什么呢？无论他如何苦思冥想，或者冒出思想火花，他也永远不可能想到毛泽东这一回的形象思维会如此地“出神入化”！

后来陆续上演的红卫兵、破四旧、天安门上八次大接见、全国大串连，一月风暴、全面内战，三年不招生、三年不上课，全国大武斗、三万工人、农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这样的措施与后果，谁能想得到啊？端的是“鬼神莫测”！

即便是毛泽东自己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想得到的。毛泽东的这些办法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边乱搞着，一边胡想着。这样的一系列办法，往前五千年，不会有人想得到；往后五千年，也不会有人想得到。在人类历史上能采用这样的办法，也只能是毛泽东一人而已。所以说无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十年浩劫”可以另当别论；但它的“史无前例”却是确凿无疑。

刘少奇面对文革乱局实在没办法。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你是“一线”呀，你得为党做工作呀？别人可当逍遥派，你刘少奇不可能；你想解甲归田，也晚了。此时的周恩来出国了，康生莫测高深，陈伯达莫名其妙，林彪躲在北戴河“韬光养晦”，陈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谁都可以躲，就是你刘少奇躲不了。你不是接班人吗？你这个接班人还得继续当下去，既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更不是你不想当就不当的；何况此时的刘少奇还恋栈着呢？还根本没有不当这个接班人的想法。

刘少奇聊以自慰的是：此时还有一个邓小平“跟哥哥进城”。

二、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自从这个国家有了这个党以来，尤其是从“延安整风”以来，“派工作组”的方法早就成为党的传统的、成熟的、有效的、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哪里出了问题，就派个工作组去解决问题；要搞什么运动了，那就层层派出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工作组从来都是代表党的，工作组从来都是凌驾于各级党委的。可以说，没有一次搞运动是不派工作组的；没有工作组领导的运动那还能叫坚持党的领导吗？远的“土改”，近的“四清”，全都是“工作组”满天飞。

所以，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做法既是党的一贯的做法，也是最安全，最稳妥、最不会受到非议与责难的方法。老革命嘛！遇到了任何新问题，当然得采用党的老传统。刘少奇这个老革命，遇到了文革这个新问题，他当然、必须、只能采取我党的老传统，最最保险、最最稳妥的办法——派工作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是什么选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属性。就像下雨天要撑伞。

#### （四）刘少奇的老办法催生了毛泽东的新办法

凡搞运动，就是整人，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人运动。通过整人达到政治目的，而整人本身就是目的。文革刚开始时人们对文革的理解也是这样，整人目的不变，具体对象虽有所不同，但方法总是大同小异的。

无非是党中央发号召，在各级党委、或临时替代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忆苦思甜、学习文件、忆失权之痛苦，思有权之幸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深挖猛批、斗倒斗臭，最后分门别类地戴帽子、杀关管，在原来的干部队伍及新建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吐故纳新，重新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建成了，运动就结束了。留下的一屁股屎，慢慢再擦，这就是运动后期的所谓落实政策、甄别。

笔者曾于65年下半年至66年上半年在北京郊县的一个“三类队”搞四清，“四清”就是这一套程序。

文革开始时，虽然运动来势凶猛，但谁也不会想得到这一回的方法全变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一星期左右的了解情况，毛泽东就悍然决定全部撤回工作组，不久又宣布所有的工作组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到后来实际上也“踢开党中央闹革命”，各级政府瘫痪了，各级党组织垮台了，连“中央书记处”也瘫痪了，党团组织全都不要了，毛泽东只要了一个以他老婆挂帅的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又要了一个自己新鼓捣起来的“红卫兵”，接着开始八次大接见、破四旧、不上课、大串连，让乳臭未干的学生娃娃打着“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旗号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所到之处，藐大人哉。

这种办法，除了毛泽东本人外，即使是刘、周、朱、陈、林、邓六个脑袋加在一起也想不到。其实这一系列的办法，既不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更不是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以对工作组的态度，毛泽东起码也经过了三次变化：

一、6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是赞成的

有史实为证：



1. 5月29日，中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5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于是在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

2. 6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两篇电讯稿时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其中一篇就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决定的内容有三条：

1. 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
2. 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3. 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看看这三条内容，其实都是后来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而这两篇电讯稿都在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

二、6月中，毛泽东的态度渐渐由赞成变为暧昧

也有史实为证：

1. 6月10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2. 6月12日，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这两条史实说明6月中旬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主张“不一定派”、“派了太快了并不好”，由“支持”转变为“暧昧”，但仍然不是坚决反对的。

三、直至7月下旬，毛泽东的态度才最终演变为全盘否定。

对于这一条，当然就有更多的史实为证，此处无须赘述。

“全盘否定”的原因很多，不外乎：

1. 刘少奇派的工作组确实普遍犯了错误，他们将“文化大革命”引导向又一场“反右派运动”，确实将一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打成了“右派学生”。

2. 刘少奇无法领导江青，江青也瞧不上刘少奇。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对文革进行强势领导，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处于被动、边缘的地位。

3. 正由于刘少奇派了工作组，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就要反对工作组。

走笔至此，又想起那段著名的林彪语录：“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可是，毛泽东就是不“先说东”，让你干着急，所以无论你“先说东”还是“先说西”，结果都是错。林彪当然是极聪明之人，但刘少奇也不是极愚笨之人；林彪有这样的感想，难道刘少奇就没有？

1966年中的林彪基本上还是逍遥派，他有条件躲在北戴河去看风景，但是身处第一线的刘少奇就“身不由己”了。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身不由己”者轮到了林彪，于是林彪重演了刘少奇的故事，

刘少奇的工作组确实是犯了错误的。笔者的这篇拙文也绝不是为“工作组”的错误翻案的，这要强调说清楚。关于工作组的错误，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加以阐述。

但是，笔者认为工作组的错误绝不是罪不容诛的。如果这是一个团结的中央，如果“打倒刘少奇”不是毛泽东的既定目标，那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应当采取“补台”的态度，而不应当揪住小辫子，一棍子打死。如果毛泽东能采取“补台”的态度，那么刘少奇幸甚！中国幸甚！而毛泽东本人更是幸甚！

#### （五）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问题是毛泽东锁定了目标，问题是刘少奇被盯上了。

如果，刘少奇没有派工作组呢？难道就没有小辫子可抓吗？仍然会有的。如是，毛泽东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刘少奇：

你在北京，不要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党的领导是“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条，你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你在北京“专政”得好啊！

“派工作组”是一件无论如何也不落好的事，派了固然错，不派也是错。无论刘怎样搞，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注定被打倒。

“派工作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代替已经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继续行使党的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所以必然要将“维稳”放在第一条。连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都达不到，那还如何加强并实行党的领导呢？

所以，工作组总与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是政治生态中的“天敌”，又与另一部分人是天生的“盟友”。发展下去必然依靠“盟友”打击“天敌”，抓游鱼、反右派。一旦得逞，就必然牺牲一部分群众；一旦失败，则牺牲另一部分群众。

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最好不派工作组。可是不派工作组，谁来行使党的领导呢？乱局如何来收拾呢？谁能保证小乱局不会发展成大乱局呢。

试想一下，假如刘少奇此时坐在中南海喝茶抽烟什么也不干，邓小平继续呼朋邀友打桥牌，他们都像毛泽东那样“任凭风雨起，稳坐钓鱼台”，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气魄坐看云卷云舒，那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是会赞扬刘少奇还是会责问刘少奇呢？

如果毛泽东回到北京，看见的是既没有各级党委了，也没有代替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而放任革命小将们乱斗乱批，那又该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

比如在我们清华，这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党委书记蒋南翔斗一通；那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副书记刘冰斗一通；这个班的将蒋南翔树的干部标兵吕应中戴上高帽子游街；那个班的将蒋南

翔树的学生标兵叶志江浇上黑墨水搞个飞机式……。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10的N次方的斗争场面。

面对这样的乱局，毛泽东也同样可以写上另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可以这样写：

“党的领导”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宝，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放肆怂恿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肆无忌惮地乱斗、乱打、乱杀，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乌烟瘴气，将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搞得面目全非，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

请问：面对这样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刘少奇又当何以作答呢？

□ 原载《共识网》

~~~~~

【读史笔记】

《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

• 文 研 •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五十年的日子，很高兴看到《王大宾回忆录》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文革运动的新视角、新观点。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毛泽东发动群众、介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场政治运动。反思这场文革运动，不只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运动、为何能够发动这场文革运动，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大势的掌控，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你不把毛泽东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你对文革运动的回忆，往往就容易失实，失之于偏。这也是认识论的观点，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战略目标，是要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所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毛泽东要重回一线重建他能亲自掌控与运作的新的权力系统，在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接班人，保证其社会主义路线的传承。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已不能用依合法程序的会议政变形式实现，必须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由此，毛泽东在完成发动文革运动的准备，制定和发出“5·16通知”，启动文革运动后十年，有三个不同的战略运作阶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为破坏旧秩序，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所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阶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为建立新秩序，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式，重建新的权力系统的阶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为巩固通过文革运动所建立的新秩序阶段。

《王大宾回忆录》根据这个认识，回忆和反思了他的文革运动经历。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运动中成立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以及由它发起和为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为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反工作组造反派的旗帜、破坏旧秩序的先锋队。1967年3月5日，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王大宾，后亦被毛泽东美誉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北京59个大专院校，北大、清华、地院，在文革运动发动、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阶段，在不同时段分别起了带头与示范作用。而抓典型引路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5·16通知”下发后，毛泽东在捕捉发动群众的突破口。5月23日，吴传启等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贴出了批判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时任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但并不具有动员群众的典型作用。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批评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批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果如所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沸腾，学校师生对学校党委领导批判造反的热情高涨。因北大四清运动，以聂元梓等人为代表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与彭真支持的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早已处在严重分歧与对立冲突中。打压他们的彭真，在“5·16通知”传达时已被点名批判，给了聂元梓等人勇气和批判方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情况、分歧与冲突，毛泽东应早已知晓。张恩慈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函毛泽东已有批示。北京大学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作为发动群众投入文革运动的第一把火，其作用与影响确是历史的事实。

毛泽东欲擒故纵。刘少奇误判文革运动，采取派工作组的方式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有的工作组称为“抓游鱼”等），他还派王光美做清华工作组的顾问——实际上让她掌控清华工作组，介入清华文革运动，意欲再创建一个类似四清“桃园经验”的“清华经验”。王光美在清华五十天，指导工作组打压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结果搞出七八百名右派，其典型人物就是蒯大富，所以当时清华的右派也被称为“蒯派”。清华这次“反右派”运动成了1966年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压倒刘少奇的最显著的一根稻草。毛泽东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决定撤出领导文革运动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表示对红卫兵“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字报的“热烈支持”。中国大陆的人民群众，自此在文革运动前期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结社自由。毛泽东更在1966年8月18日，穿上绿军装，戴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公开表达了对红卫兵造反的支持。蒯大富对抗王光美主导的工作组个案，清华大学的地位与影响，无疑是毛泽东打破刘少奇一线主导的旧秩序的利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陶铸在文革运动的前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文革运动出现了延续工作组路线的保工作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严重分歧与对立。在文革运动的这一时段，被薄一波“6·22批示”打压、视为“右派”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少数师生，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在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以其鲜明、激进的反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方向，第一个组织带领上千人的队伍，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的造反行动，震动京城，亦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肖力，随时了解与掌握了这一时段地院文革运动的情况、态势。9月6日，联合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地院东方红为头的“首都三司”成立。“首都三司”代表的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成立之初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它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代表在文革运动第一阶段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的造反大方向。经过1966年8月、9月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已阵线分明，发展到互

不兼容、激烈对抗的局面。1966年9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与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兵团，为争夺学院广播台的控制权发生的肢体冲突，被视为文革运动中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一次武斗事件。时任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首先赶到北京地院处理这一事件。但吴德依据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平息事件，无法摆平双方的对立冲突。吴德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随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亦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周总理指示后，戚本禹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随后有林彪1966年国庆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掀起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高潮。保守派组织迅速瓦解，反工作组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依靠发展左派队伍，瓦解保守派组织，团结大多数群众，向刘少奇掌控一线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造反，成为当时毛泽东处理文革运动中分裂与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也随之成为这一时段北京高校文革运动中造反冲杀出来的新典型、新领头羊。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被毛泽东视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是真实反映了地院东方红、“首都三司”在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中的地位与影响的。《王大宾回忆录》记述的这一史实，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更完整地还原文革运动历史的真相。

在许多记述北京文革运动的书中、文章中，都会拿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1967年后所谓“天派”、“地派”之分，所谓“天派”与“地派”的斗争说事。据我了解，被视为“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与视为“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他们都不承认北京有因一个焦点矛盾而对立分裂的有组织的天派、地派。《王大宾回忆录》中对这一认识表述了他的观点。我认为是符合当年北京高校文革运动真实情况的。

1967年，文革运动已进入毛泽东建立新秩序的新阶段。争夺在新秩序、新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军队、干部与群众组织三者之间的博弈。分歧、冲突、对立已不像第一阶段那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左派、保守派已难以认定判断。毛泽东为了实现第二阶段建立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必须面对现实，权衡利弊。面对周恩来支持的老师，副总理们在1967年2月，代表干部群体表达的强烈不满情绪，虽大为震怒，亦不能不最后妥协，示出团结的善意，并发社论宣示正确对待干部的方针。还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将打击干部一大片的过错，加之于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对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军队支持下，表现出对王力公开讲话宣布、而实为毛泽东所决定的处理武汉问题方针的激烈反抗，毛泽东决定改变过往处理文革运动中分裂与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依靠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群众的方针，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平等大联合的方针取而代之。毛泽东同时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斗争方向，果断处理了王力、关锋等人，稳定化解了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年，王大宾对毛泽东文革运动战略阶段与战略方针、部署的转换，是认识不清楚的，头脑膨胀、犯错误是必然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中，批评造反派组织多中心即无中心表现，认定山头林立的众多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实已成为了建立新秩序的阻碍，起了破坏作用。《王大宾回忆录》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反思1967年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的个别冲突事件，反思地院东方红与北大新北大公社之间1967年4月发生的民族文化宫展览问题上的冲突。王大宾后来主张东方红应专注学院运动，不要介入外单位运动的想法应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亦骑虎难下，无法掌控。王大宾对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他们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有他自己的反思，也认识到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自己不行，最终被毛泽东“不要”是必然的。对此，回忆录中有较为明白的理解与评述，亦值得亲历过文革运动那段历史的人们和研究者深思。

以孔丹为头的“西纠”在成立之初，即在地院东方红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时，就彼此发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事过近50年，孔丹在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表明他们这些老红卫兵，“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人，与地院东方红王大宾这样的反工作组造反派，“具有本质的区别”。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批评了孔丹的这一说法，认为其骨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左右他的思维与判断。不知孔丹能否接受对他的这一思想的评说与批评。因为他在书中表白，当年他是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狂热鼓吹封建血统论的对联的。

然而，孔丹的认识与想法，可以影响到上层的政策，区别对待处理同样参与文革运动同样事件的人。《王大宾回忆录》记述了他为何取代朱成昭，由二把手变成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叶剑英对文革运动的态度，如何通过其女儿叶向真影响到朱成昭，成为他从听从中央文革转向对它的怀疑、批评的主要动因。叶向真与朱成昭等人，后虽同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关进监狱，但结局却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王大宾感慨评说：“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王大宾对朱成昭人生命运的感慨，亦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感叹。文革运动中，能打上王大宾个人印记的大事件，应只有奉命参与并负责把彭德怀元帅从成都揪回北京这件事了。《回忆录》详述了王大宾参与这一事件的过程与细节，澄清了过往许多书籍文章关于这件事的不实、不全的描述，还原了历史真相，是《王大宾回忆录》的一大看点。在这一事件中，王大宾一方面在与彭德怀的接触交谈中，同情彭德怀的处境，并在认识上产生共鸣，为此不同意中央揪彭决定，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申述他们的意见，但却遭到批评；另一方面，最终执行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成都军区派出干部一起，负责带领地院东方红的战士，把彭德怀安全护送到了北京。这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当年的客观存在，王大宾不能否定，他也从未否定。但令王大宾不理解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可以对同时存在的客观事实，选择性地认定、采信，并据此作出惩罚。在巩固文革运动新秩序的阶段，曾经发动了清查“5·16分子”的运动，王大宾被认定为同情彭德怀，抗拒执行中央从成都揪回彭德怀的决定，据此指控为王大宾的主要罪行，将其打成“5·16分子”，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王大宾的人身自由，关押审查四年之久。而至文革运动结束后的1978年，又将王大宾逮捕关押五年，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面对完全不适用1979年7月6日颁布、1980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审判，王大宾只能感叹：“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政治。”

王大宾写出他在文革运动中亲历的事，并公开出版发行，值得欢迎。这为研究和反思文革运动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献。我和王大宾一样，期待《王大宾回忆录》引起关注，期待人们的争议与批评。

2015年10月于深圳

~~~~~

## 【研究评论】

警惕对“文革”的过度理想化解释框架

“文革”时期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红卫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上面”（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不管是亲历者还是非亲历者，常常归之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教育（“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这种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只接受过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知识灌输），而不是人格的或者道德的缺憾（比如因为利己心、因为恐惧而选择放弃独立思考）。换言之，这种盲从从主观或情感角度看源于真诚的信（虽然这信现在看来经不起理性考量），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它危及自己的时候）。

但阅读近期出版的《我们忏悔》（王克明、宋晓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一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盲从，这种盲从谈的人相对较少，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更准确说，他们即使具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从最基本的生物性生命存在，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其他利益），由于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特别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话与做事（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等等）。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有大量的盲从者是属于后者。他们盲从和跟风的原因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主要原因是无知，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思想储备，属于不能而非不为），而是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或至少是怀疑的能力，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心存疑虑，但是由于恐惧、由于利害得失的考量，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敢说出真理。但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回忆录却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好像反右、“文革”中的盲从者真的都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的一些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而非“文革”经历的文字。据其记叙，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得邵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估计是一个更大的官）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如果说赵遐秋对权力的巨大恐惧是她放弃独立思考的直接原因，那么，利益和私心（包括求生的欲望）就是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赵对“组织”的畏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她要求“积极上进”。果然，转变立场和思考方式之后，她的表现终于得到肯定，并于1958年如愿入党。抚今追昔，赵遐秋感叹：“反右派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永

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求心安理得地去执行”，“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讲话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好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那智慧的大门。”（第45页）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个“智慧大门”是被作者自己有意地关闭的，她不是不能想或无能力想，而是“不敢想”。

赵遐秋记叙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彭德怀案的。组织上传达了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后，赵遐秋本来是很怀疑其正确性的，心中的疑问“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第46页）说到底，还是“不敢”。

更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后赵遐秋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使得赵遐秋认识到：自己参与“反右倾”运动，批判同学高永波和邢志恒是错误的：“胡庄农民的极度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她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一切。我后悔莫及”。（第49页）但就在这个时刻，恐惧再次袭来，“我又害怕了起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么？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于是再次说了拥护反右倾的“套话、假话”。（第49页）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不掌握不同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另一套思想和知识，一个具有基本认识能力、尊重经验事实的人，仍然能够基于经验而发现极“左”意识形态的荒谬。但是由于缺乏坚持的勇气，最后她仍然选择放弃了怀疑和独立思考。

赵遐秋是诚实的，她坦率地承认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治前途”不能仅仅理解为仕途的升迁，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保住生命。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极权社会，政治立场不仅决定仕途，而且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升迁，而且还会失去自由，失去生命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直至失去性命。因此，我指出赵遐秋（也包括其他很多跟风和说假话的人）不敢坚持独立思考是因为缺乏勇气或由于现实考量，绝没有责备和苛求的意思。毕竟不说真话毋宁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道德要求。我只是想借此表明：虽然“文革”时期很多人的盲从不乏真诚，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缺乏另一种思想和知识，但这种真诚的盲从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特别是曾经盲从、跟风的知识分子，夸大自己盲从的真诚无知的一面，而避讳其利益考量的一面，犬儒和投机的一面，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君子耻于言利”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无心之失总比有意犯错要光明正大一些。但这样做的消极后果，是不能从根源上反思极权主义，在夸大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洗脑力量的同时，低估了其对物质、经济、政治资源特别是暴力的垄断的决定性意义，看不到这种垄断才是极权主义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也是它的意识形态得以推行的根本保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谬性对很多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饥荒爆发后更是暴露无遗。但由于极“左”权力垄断了生命得以维持的物质资源，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荒谬性，更不要说纠正它了。

强调这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获取批判和反思“文革”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已经变得比以前远为容易，因为无知而放弃独立思考的盲目跟风者已经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和犬儒之辈。但是如果权力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资源，而且意识形态与人们基本生存之间的联系依然不能打破，如果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依然是高昂的生存代价乃至生命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说假话。



□ 原载《明镜邮报》

~~~~~  
【冷暖人间】

劫后拾珠——记北京 101 中学文革中的几件小事

• 曹 培 •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过去了，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罪恶和苦难，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疯狂、不理性、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心中自私、残忍和冷漠无情的一面。在搜集、记述当年的这些故事时，无意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闪亮的珍珠。小心地把它们拾起来，托在手心里，细细体味，它们散发出了一种自然、柔和、纯真的温馨之光，令人动容。这是永恒的人性的善之光。

◇ 玉米田守望者

1966年8月，也就是所谓恐怖的“红8月”，社会上一片腥风血雨，被蛊惑的青年疯狂地向他们的长辈、老师抡起了军用皮带。被殴打致死的受难者、被逼迫自杀的人，几乎每个单位都有。101中陈葆琨老师已经被殴打致死，更多的干部教师正遭到残酷迫害，生死命悬一线。如政治教研组长陈司寇老师在残暴的殴打下，几乎丧生。语文教研组长汪瑞华老师，在一天晚上，被红卫兵揪到操场上毒打，扼住喉咙几乎窒息，遍体鳞伤。

任彤云，原郝人初校长的警卫员，文革前的总务处副主任。他的出身工农和老革命资历使他在文革中颇受尊重，还被吸收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革筹委）的成员。汪老师被毒打时，她家属曾找他求助，可是朴实忠厚的任彤云在革筹委里只是个摆设，说话根本没人听。万般无奈中，任彤云就对汪瑞华老师说：“要不你和陈老师晚上就来我家里躲一躲吧。”汪老师和陈老师确实不敢回家，可是躲到任彤云家多有不便，而且万一被左邻右舍告发了，不仅罪加一等，还要连累任彤云。最后她们决定躲到任彤云家附近的玉米地里。任彤云家旁边就是学校的玉米地，有个用玉米秆堆成的垛子。天一黑，两位女老师就钻到那个玉米垛子里过夜，任彤云就帮她们“望风”。夜里尽管有蚊虫叮咬，难以安睡，但至少暂时不受人身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两位女教师在玉米垛子里躲过了那些最恐怖的夜晚。

◇ 午夜暴力劝阻人

1966年“红8月”期间，学校红卫兵中有个“夜老虎队”，专门夜晚出动到干部老师家里抄家打人，学校家属院夜晚常听到有人高喊：“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

副校长文方首当其冲，多次被红卫兵殴打。他家旁边有条不太深的水沟，文方和夫人冯老师都曾被打到水沟里过，处境非常危险（陈葆琨老师就是在水池里被殴打溺水而死的）。住在文方房子后排的工人师傅刘德新、贺文昆听到动静，都立即过来劝阻学生。他们站在红卫兵和文方中间，用“要文斗不要武斗”讲理，有时还硬抢下红卫兵手中的皮带。因为他们是工人师傅，是“领导阶级”，又是学校工人师傅组成的“工联造反团”成员，红卫兵也不便和他们对抗，常常就悻悻地离开了。此后，每当红卫兵挥着皮带从文方家的前门进来，冯老师或孩子就赶紧从后窗跳出，去敲刘德新和贺文昆两位师傅家的窗户求援。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师傅们都关灯睡下了，文方一家人还不敢睡。“夜老虎队”一出现，二位师傅闻讯

二话不说，穿好衣服就过来把学生们给劝走。文方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他们的多次保护，我可能早就被打死了。”

◇ 勇敢的白衣天使

校医段箴大夫身材瘦高，文静柔弱，说话缓慢。记得当学生时找她看病，即便是非常小的伤病，她都十分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看完病还要嘱咐一些令小青年不耐烦听完的话。文革期间，学校卫生所也被贴满了大字报，无非是批评她爱穿高跟鞋、爱烫头发之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人给她画了漫画，把她的名字故意改写为“断针”。

面对这一切，段大夫好像并不介意，照样一丝不苟地为师生看病，特别是那些被打伤了的“牛鬼蛇神”。只要一有人叫她，她立即背下药箱去救死扶伤，无论是白天黑夜，也不管伤者当时有什么政治问题。当时这些“牛鬼蛇神”受尽了周围人的呵斥、咒骂、唾弃，或者冷漠回避，只有段大夫一如既往，温和细心地询问病情，认真周到地医治，使得那些正遭受政治迫害的老师，感到这世上仍有人把他们当人对待，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在汪瑞华老师半夜遭受毒打之后，段箴大夫立即赶来给汪老师敷药，见伤势严重，直说：“惨不忍睹”。敷完药又对汪老师说：“你不能劳动了，休息两天吧。”给汪老师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汪老师当时在劳改队服苦役，每天清早7点就要集合。凭着段大夫的假条，汪老师在家躺了两天，才算缓过气来。段大夫当时能够顶住压力来看病、开假条，令汪老师至今感激不尽。

初中的班主任杨文荣老师在文革中也遭到学生的毒打。有一次杨老师的鼻子突然出血不止，一直接了两个脸盆还在流。旁边的一位年轻老师竟说：“别管她，流死她！”段大夫知道后，立即赶来，先用棉球为杨老师塞住鼻孔，然后用自行车推着送杨老师去海淀医院。一些学生围在旁边骂骂咧咧，还向她们投掷石块。段大夫却始终推着杨老师，坚决地往医院走，结果自己也挨了不少石块。这一幕让杨老师终身难忘。她说若不是段大夫的及时送医，自己那天恐怕性命难保。

文革中受到段大夫救治的老师还有很多，例如教史地的卢念能老师，文革之后曾到段大夫家，感谢她在文革中救了她。

可惜这些老师和段大夫都已经谢世，我们无法了解到更多的具体情况。但段大夫这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治病救人的医者风范，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 稻田“绅士”

1967年的11月，稻田里的泥水在夜晚已结了层薄薄的冰，成堆的稻子却还堆在稻田里，劳改队的干部老师们被驱赶去搬运稻捆。老师们有的排成一列长队，相互传递着。有的自己抱上几捆，在泥水中艰难地行进。负责劳改队的高一（1）班学生高丁等人，坐在稻田旁边的小山坡上监视着他们。他们一边呵斥咒骂着，一边把泥巴土块投掷到他们看着不顺眼的老师身上。

最遭罪的要数当时年已65岁的校长王一知，高丁等人命令她只能自己搬，不许参加传递；还给她指定了一大堆稻捆的任务，不搬完不许休息；每次抱上两捆还不行，一定要加到3捆。王校长吃力地在泥水中跋涉着，挣扎着，一刻不敢停顿。稻茬把她的腿和脚扎的血淋淋的，学生们投掷的泥巴土块，不断地落到她的头上和身上。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那样地孤

独和无助。这时，一位又高又瘦的男老师走到了王校长身边，毫不犹豫地帮她扛起了沉重的稻捆，迎着那不断投掷来的石头土块，以及监管学生的谩骂呵斥，在泥水里一趟趟地来回运送着，直到全部完成了指定的“任务”，王校长得以上岸休息。这位“绅士”，就是语文老师雷天奕。

雷老师原来在新华社工作，还教过大学，是搞文艺理论的。因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被从新华社下放到中学来。1958年，区委调查组来学校抓“政治思想工作”，听了雷老师的课后，认为他在课堂上“放毒”，使他成为被重点批判的对象，学生们也拒绝上他的课。王一知校长曾为此亲自来听他的课，并说：“我听了他一个月的课，这个老师很有学问，没有什么问题。”雷老师的处境，才因此好过了一些。

文革中，雷老师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可能是因为长期被批判的缘故，这个高个子的书生患有多种疾病，平时总是弓着背、苦恼地皱着眉头，说话低声下气的。只有这一次，他挺直了腰，做了一回真正的汉子和绅士。事后，王校长感慨地说：“雷天奕那天真是救了我的命！”

◇ 劳改队里的“校长秘书”

汪瑞华老师和王一知校长，一直就是工作中的老搭档，还在上世纪50年代的华北中学时期，汪瑞华老师就曾当过王一知校长的秘书；后来，在101中学时期，她又一直是语文教研组长、学校工作中的教学骨干。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劳改队里时，当汪瑞华老师自己也饱受迫害折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她还一直坚持着照顾王一知校长。

当时，王一知作为101中学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黑爪牙”，在劳改队里饱受迫害：挨的打最多，干的活儿最苦，受到的各种虐待折磨也最多。红卫兵和工宣队还要求劳改队里的老师揭发她，不揭发的就是“保皇派”，罪加一等。监管劳改队的学生也曾多次要求汪老师揭发王校长，但她却说：“我实在不知道，不能乱说啊。”于是，她又被罪加一等，成为所谓的“钢杆保王派”。

劳改队里的老师，平时都不敢和王校长说话，只有汪瑞华老师，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着王校长。每次劳动或挨完批斗回来，王校长都一头栽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汪瑞华老师就立即帮她打水，洗脸洗脚，擦试伤口，换洗脏衣服，还帮她去打饭。打饭时也常遭到不明真相的食堂大师傅的谩骂，说她是王一知的“走狗”；有时还故意只给她们糠窝窝吃。就连劳改队里的其他老师，也劝汪老师说：“你就别管她啦，你要照顾她到什么时候？”可是汪老师始终没有放弃。在那水深火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汪老师用她那瘦小的臂膀，紧紧地托住王一知，一起在苦海里挣扎沉浮。

1972年，王一知被平反后重任101中学校长。70岁的老太太二话不说，立即拉上汪老师，一起去收拾学校当时那“没有一块好玻璃”的残破局面。

◇ 黑夜送医

1967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初一的女孩们正在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聊天，初一（6）班的文某突然闯了进来，打着哭腔说：“帮帮忙吧，我弟弟得了急病！……”文某是副校长文方的二女儿，而文方作为学校里的“二号走资派”，当时正在劳改队里被羁押着。由于文方的原因，文某平日总回避着同学们，大家也不主动与她往来。

她的突然出现，使嘈杂的宿舍一下子安静了。其中三个女同学，没有一点犹豫地立即跳下床，推上一辆自行车，跟着文某就走。黑暗中，她们看到地上蹲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旁边站着一筹莫展的文方夫人冯老师。原来她们母女正送孩子去看急诊，101中家属宿舍离车站很远，她们无力再背动他了，只好找同学帮忙。大家立即让小男孩坐上自行车的后架，抱住车座，两个同学一边一个扶着他，另一个同学推着自行车，急忙朝公交车站走去。她们走得很快，瘦小的冯老师都要跟不上了。

到车站后，她们把自行车一锁，和冯老师一家一起坐公交车到了海淀医院；下车后，又帮助把小男孩抬到急诊处；看完病拿好药打完针，她们又一起帮助孩子送回到文方家。

回到宿舍后，有同学议论她们：“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她们却立即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文方的孩子又不是走资派！”……

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文方夫妇住在他们小儿子为他们买的新房子里安享晚年，三个女孩也都已过耳顺之年。如同所有老三届的中学生一样，她们也难免会在内心里留下许多的愧与悔，但唯独对这件小事，她们至今只感到庆幸。她们也从自己与共和国共沉浮的命运中得到启发：不管外界说什么，做人只要顺从了自己的良心，就一定不会后悔。

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数中国人原本都是善良的。但是“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和暴力革命的蛊惑煽动，使得人们自然的善良本性被摧残、迷失和扭曲了，而兽性的自私、冷酷、暴虐与残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被极大地激励和膨胀，所以文革中才会有那么多的血泪和苦难。然而深入历史事实，笔者欣喜地发现，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性的善良并没有被完全泯灭，她如同劲草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田。当年如果不是这些普通人对善良的默默坚守，很多受害者都难以度过那个残酷的岁月，也许101中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会更多……

上述故事虽然都是些不大的事情，却意义非凡，正如那位平凡的人力车夫在《一件小事》里给鲁迅先生带来的启示：“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2015年10月

□ 原载《共识网》

~~~~~

## 【往事非烟】

### 动农馆旧事追忆

• 陈光海 •

#### 一、武斗避难：从主楼到石油学院

1968年的春天，清华园内风云突变，两派由原先的大字报争论、高音喇叭对骂，一下子升级到占领校内建筑战略要地作为据点，剑拔弩张，时有团体械斗及伤亡事件发生。之后两派又纷纷抢占学生宿舍楼，我所在的十号楼被团派占领，无家可归，不得不迁往主楼，与几位老四同乡校友同住一大间。校园内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住在主楼很不安全，离主楼最近的八饭厅即使供餐也不敢去。这个临时大家庭便作鸟兽散，大多暂避在京其他院校，也有

回老家的。我想回福建，但单程路费加零花钱要四十多元，一个穷学生那里来那么多钱，只得寄居石油学院避难。

在石油学院的学生宿舍里，生活安定清静，时有同乡聚会，并不寂寞。然而，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是记挂着清华园内的形势变化，尤其是老四的命运，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回校走走看看。

## 二、第一次手持长矛

五月十日那一天，我又回到了学校。在动农馆，守楼的、来打探消息的老四众多，人声鼎沸。无九老四头头刘晓光（于几年前过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他说，今天老四要在动农馆前召开批斗原电机系书记走资派陶森大会，要我一起参加大会警卫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我想只不过是“警卫”而已，批斗大会结束就走人。再者碍于面子，无法当面拒绝他的请求。集合队伍时，发给我一顶柳条帽、一副铁皮制的护身盔甲、一根长矛。不是“警卫”吗，还用这些东西干啥？我大大地低估了“警卫”一词的含义与份量，想退出来已是悔之晚矣。

我们排列好队伍，快速步出动农馆，向二校门方向出发。一到现场便傻眼了，老团来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对方的长矛队早已排好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长矛队后有几百位老团群众在助威呐喊狂叫谩骂。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最南面的第一个位置，靠近通往照澜院大桥的桥头。桥头上挤满了围观的老团群众，近在咫尺。我脚跟还没有站稳，便挨了老团砸过来的几砖头。从来没有看到过武斗场面，更没有亲身经历过，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发慌，神经绷得紧紧的。我胆怯得很，想往后退又绝不能退，后边还有两排警卫人员，我一退整个队伍就要乱了。只得硬着头皮、故作镇静、小心应对。好在与我相对的老团，手持长矛，站着一动不动，长矛倒是没对上，桥头方向砸过来的砖头，却如雨点般地飞来。我东躲西避、前后腾挪，大腿小腿上还是挨了很多下。揪斗大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便草草收场，整个过程双方长矛队只在中间地带有过几次进退攻防，两侧基本上是对峙不动。回到动农馆后才发现，我的大腿小腿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及皮破血流的轻伤。在现场时不觉得，待精神放松后才感到被砸受伤处热辣热辣的，胀痛胀痛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动农馆，一直到七二七。

## 三、为了解救科学馆一百多位四一四兄弟姐妹——挖地道

动农馆的守卫人员主要由动农系及无线电系学生组成，也有少数其它系学生及动农系教职工。无线电系人员以无零零、无零、无八为主，无九只有两位年级老四头头及我三人。因为之前没参加任何战斗队，长矛队有任务不会通知我参加。动农馆楼顶上设有岗亭，平常的主要任务就是楼上值班放哨，24小时不间断，人员轮换，以防老团偷袭。

5·30这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动农馆内空空荡荡的，死一般的寂静，我预感到有什么特大事件要发生。一问方知老团正在急攻东区浴室，老四主力都赶赴东区与老团对垒，以解浴室之围。5·30一战，老四伤亡惨重，镇守浴室的老四全部被老团俘虏，还死了人。动农馆再也见不到之前“兵强马壮”的场面，一个个神色严峻，悲愤填膺，欲哭无泪，士气十分低落。此后天天都有一批人离开动农馆。无线电系老四的主要头头及无九老四头目都相继离开。多数人选择离开动农馆，馆内一下子冷清有了许多。我的性格固然懦弱，却十分倔犟，既然已经进来了，不肯轻易出去。何况被老团严密包围的科学馆里，还有一百多位四一四兄弟姐妹。为了他们，绝不能离开，也绝不会离开。

5·30后，科学馆被团派团团围住，馆内老四受困于馆内，不能出大门一步。总部决定从动农馆与科学馆双向对挖地道，以解救科学馆内100多位老四脱险。指令一下，大家一刻也不停留，马上干了起来。由于施工现场受限，每班只能两人工作，一个挖掘，一个运土，两人随时互换。为了加快进度，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挖掘不停歇，人员轮换。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楼顶值班和挖地道。值班时常常遭到老团的弹弓袭击。老团的弹弓威力极大，打得岗亭“嘣嘣”作响。有一次一位老师值班，不小心被老团弹弓射来的砖头击中，当即打掉了两颗门牙。

为营救科学馆的老四，动农馆的同学们天天挖地道，日以继夜，轮班作业，拼命干活，谁有空谁就上，一刻也不停歇。工程进度极快。眼看地道即将合拢，马上与科学馆的战友会师了，大家都很高兴。谁能料到7月16日清晨，地道被老团炸塌，捉走了一位挖地道的老四，还往地道里灌满了水。

#### 四、一周内三次遇险，死里逃生

久围不下，老团中的极端分子恼羞成怒，于7月9日火烧科学馆，科学馆楼顶一片熊熊大火。动农馆内的一些老四在楼顶观望火势时，有人被老团开枪射中。我闻讯跑下楼，只见张继昆已躺在担架上，开始往门外抬，抬者是动农系的杨仲文及陈泽荣。两人身材矮小，特别是陈泽荣，身体单薄瘦弱，刚上路就摇摇晃晃的，十分吃力。我忙上去抢过陈抬的担架这一端，叫他协助前边的杨仲文一起抬。张继昆十分健壮，体重160多斤，抬着非常吃力。刚过大桥，二校门方向就不停地朝我们开枪，子弹呼呼而过。为防枪击，我不得不猫着腰弓着身，全靠手臂用力抬，累得够呛，只能咬紧牙根坚持再坚持。到达主楼送张上汽车后，我一个人顺着人行道返回，一上大桥老团又开枪了。过了桥就是动农馆，我快步朝前跑，几颗子弹呼啸而过，好像就从我的耳边擦过去。不对！我赶忙卧倒，匍匐前进，扒在大桥栏杆一支立柱后边。又一颗子弹飞来，不偏不倚正打在这根立柱上，弥漫着些许尘埃。弹洞离地面约一尺多高，若无立柱挡着或子弹往外偏移十公分（立柱只能遮掩身体的一小部分），必在我的脑袋上开花无疑。我的心“砰砰”地直跳，一动也不敢动，象死了一样在地上扒了约莫一两分钟。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得想办法脱离险境。往前或往后跑会将全身暴露在枪手视野之内，往南横穿马路同样不行，只能往北翻越栏杆跳河了。于是，我猫着腰站起来，发现大桥栏杆外侧下面有几根粗管子（可能是自来水管和暖气管之类的金属管道）紧挨着大桥下沿，横跨小河两岸，便快速翻身跳下，沿金属管道顺利跑回动农馆。好险啊！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两次来京出差专程到清华，动农馆边大桥上的那个弹洞依然清晰可见。1999年来清华，弹洞遗迹已荡然无存。

过了几天，我在动农馆东门前看到，动农系的几位老四在挖好的沟壕北侧（旧水利馆方向）用制图板等物件立屏障，以防旧水利馆老团对过往老四进行枪击。突然间一声枪响，一颗什么东西从我的后脑勺钻了进去，一摸粘乎乎的有血，糟了，不会是子弹吧？心里一阵紧张。但我的意识十分清楚，是否回光返照？我紧紧按住后脑勺的伤口，沿着新挖的沟壕跑向主楼。主楼方面派车将我送到北医三院。医生检查后，取出一小块如铁屑般的卷曲金属物，再缠以纱布包扎伤口，说无大碍。估计是旧水利馆的老团开的枪，子弹打在如钢管之类的金属物上，蹦出的碎片击中后脑勺。回到主楼后，记得是张雪梅亲自张罗安排做的病号饭（蛋炒饭），当天下午回动农馆。

我带伤（头上还缠着纱布带）坚持参加挖地道。一次与动农馆头头朱振奎同班挖掘，他说地道再过一两天就要合拢了。没想到第二天（7月16日）清晨地道被老团炸塌，捉走了一位老四，还往地道里灌满了水。我闻讯下地道趟着水，一直到被炸塌的洞口附近。此时洞口外有人往地道里扔进了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爆炸，没掀起多大的浪花，更没有伤及我。

一周内三次遇险：第一次遭枪击有惊有险；第二次遭枪击有惊无险；第三次遭手榴弹炸无惊无险。特别是第一次，我扒在大桥立柱旁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面临死亡的严重威胁。学姐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提到，蒯大富曾授意手下，可以五支枪同时对准老四射杀，到头来要查也很难查清，免得承担责任。这次遭枪击当属于这种情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保住小命，只受轻伤，实属不幸中之大幸！

记得5·30后，动农馆里的老四除杨树立遭老团穿甲弹击中死亡外，有多人遭枪弹袭击受伤。“铁蛋”在通往主楼的人行道上遭枪击，子弹贯穿小腿，留下两个伤疤，他是第一个受枪伤的，所幸未伤要害，包扎好伤口，又回到动农馆。张继昆观看科学馆楼顶大火遭枪击，子弹从右上胸近肩部处穿入，至背部穿出，造成整个右手臂失去知觉，残疾终生。姚清信（已过世）、杨明杰遭手榴弹炸伤，姚一只眼睛被炸瞎。我只是受了点轻伤。陈泽荣也有差点被旧水老团射来的子弹击中的经历。

顺便提一下，工宣队进校后，有一天我在八饭厅前打排球时，发现一块儿打球的电机系一老四同学（个子较矮，皮肤白净，偏爱排球），腿上有多处伤疤，问及方知他在守九饭厅浴室时被捉，老团要他用手提扩音器向老四喊话“策反”，不从就捅一刀，被捅了多刀之后，他实在忍受不了，向老四喊话。

## 五、从7·16至7·27

7·16地道被炸遭到严重破坏后，大家都十分沮丧。解救受困于科学馆内老四的唯一途径被切断，希望的肥皂泡就这样彻底破裂了。

从7·16至7·27这十二天时间，是动农馆内最最难熬的日子。本来5·30后动农馆就少了欢声笑语，这下子更是没人吭声。再也不需要挖地道了，整天大家都阴沉着脸，心中那种沉重的压抑、深深的忧郁是难于以言语来形容的。

面对现实，科学馆被团派团团围困，解救无望。动农馆是老四离科学馆最近的唯一据点，毋庸置疑，必需坚持守住动农馆。有动农馆在，科学馆内的老四至少还能看到一点希望；若动农馆失守，科学馆内的老四无异于束手待毙。自无0的杨明杰、姚清信另有任务被调走后，驻守在动农馆内的人员一共只有十三人，人数少得不能再少了，虽与科学馆成犄角之势，却处于老团的半包围之中，自身也十分危险。倘若老团来攻，能守得住吗？我多少有一点担心。但是我决不会离开动农馆，因为科学馆内还有一百多位四一四的兄弟姐妹，其中还有我的同乡好友房0的姚荣达（于2011年过世），及无96的女同学黄斐萍。老四占领科学馆后，黄在一次搞卫生擦拭纱窗时，不小心从三楼直落掉下，我曾到科学馆探望过她，所幸只受点轻伤，未造成严重后果。为了他们两位，我也必需坚持到最后。

在那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时时暗地里想：无辜的老四群众，接连着一位一位惨遭枪杀，老四曾组织在天安门前抬尸游行过，高层应当是知情的，为什么还让老团中的极端分子继续横行作恶、滥杀无辜？！想到这里，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一种空前的恐怖感压抑得我透不过气。不过，我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决不向丑恶势力屈膝低头。

在地道被炸后的日日夜夜，在对前路无限的迷茫中，我祈祷并期盼着科学馆内的同学能早日逃出平安归来。7·27那天，我们甬说有多高兴，帮着工宣队一起拆路障，和科学馆出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狂欢在一起。我们终于坚持到最后。

我清楚地记得7·27那一天，留守在动家馆内的老四仅有十三人。他们是：冶金系的朱振奎（八字班，主要负责人，分配到四川江油冶金部属某厂。我毕业赴绵阳报到待分配期间，专程到江油拜访过他）；动农系的夏群生（零字班，主要负责人）、杨仲文（八字班，我的同乡中学校友。其在北大的弟弟曾专程到动农馆劝说他离开学校，他执意不从）、陈泽荣、岳光溪、张玉新（零字班）；无线电系的“铁蛋”（无七，北方人，个矮圆脸健壮敦实，文革前为无9 年级民兵训练教练员）、黄开开（无0）和我（无9）；电机系零零字班专门搞后勤的两位女同学张莹（北京人）和丁小平（哈尔滨人）；还有两人可能是动农系的教职工或其他系的同学，记不清了。

## 六、题外话

我生性孤独而倔犟，不关心政治，也不要求“进步”，一直至文革前几个月才搭上班上最后一批入团。1966年6月1日那天上午，我还赶到主楼上完了脉冲技术实验课，全班五十多人仅十多位同学到场，我是其中之一。动农馆前斗陶森大会后，我收到从福建老家发来的电报及电汇（当时二校门邮局已迁往校外，邮来信件摆放在窗外），叫我立马离开学校回家，我固执不听劝阻。想不到我会被卷入了政治，而且卷入得那么深。所幸的是我与四一四一样，算是命大走运，保住了小命，逃脱了毒打，最终全身而退。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我遭到全家人的痛斥和责骂，我十分理解家人为我的行为长时间担心受怕的那种心情。然而，回想起四十五年前己之所作所为，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为反对人性之恶、坚守人性之善，坚持到了最后。

2014·7·16 定稿

（作者陈光海，1945年生，福建莆田人。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